

# 武昌起义——千年皇冠的坠落

“九省通衢”夜半骤响的枪声，  
引发起势无阻挡的遍地烽火；几经  
挣扎，紫禁城无可奈何地失去了往  
昔的辉煌，南京、北京政制变迁，宣  
告了一个漫长时代的结束。



夜幕中，紫阳桥的军营一片寂静，透露出阴森森的杀气。突然，一声断喝在工兵营房响起：“金兆龙，你干什么？为什么睡觉还抱着枪？”军官咆哮的声音格外刺耳：“你想造反吗？捆起来！”被喝叫的士兵奋起反抗，扭打中，假寐在床的士兵们跳了起来，“吧！”一声清脆的枪声划破了夜晚的沉静，霎时，整个军营笛声长鸣，火光烛天，人喊马叫，枪声轰响，一件大事发生了。

这不是文学作品的虚构描写，而是一个历史场面的真实反映，即著名的武昌起义的一个

断面。时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之夜。

山河破碎，国无宁日，“衰世”人民遭劫难；积患何由去？！风雷滚滚，四海同讨“洋人的朝廷”。

创建于 1644 年的清王朝，在统治中国 200 多年后，已是“四海皆秋气”。皇帝昏庸无能，权臣苟且偷安，吏治败坏，军备废弛。贪污受贿、徇私枉法、诛求无厌、穷奢极欲、媚上压下、报喜不报忧等，成为清代官场的一大特色。苛政猛似虎，国势降如流。社会动荡不安，清王朝危机四伏。然而，统治者昏聩犹不自觉，对外矜恃于“天朝大国”，夜郎自大，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对内优悠自得，抱残守缺，听任政局日非。时值西方列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经济很快出现了腾飞，“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在剥夺的基础之上。社会化大机器生产需要更多的原料、更多的资金，产品的成倍增加需要广阔的销售市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于是，西方列强就不断进行侵略、征服、残杀和掠夺。中国，就成为西方列强侵略的目标。

1840 年，发生了英国资产阶级“旨在维护鸦片贸易而发动和进行的对华战争”，即第一次鸦片战争。腐败的清朝统治者表现得十分可笑，对英国茫然不知，直至战争第三年，皇帝仍发谕旨令地方官查询英国的一些基本情况：“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

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又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所谓清朝名将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认为英军的炮火是妖魔作怪，令士兵集中民间粪尿马桶去对付，结果徒增伤亡，损兵失地。如此庸陋，焉能不败？在英国侵略者的打击下，清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并与接踵而来的法国、美国签订了黄埔、望厦条约。之后，俄国、日本等大大小小的列强打上门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侵略中国台湾、新疆、西藏的战争、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等等。战火燃遍中国边疆、东南半壁河山、京津地区、东北地区。每次战争都伴随着骇人听闻的大抢劫、大破坏、大屠杀，数以千万计的金银财物被掠夺，数以亿万计的财产被焚毁，无数中国人死于侵略者的炮火和屠刀下。

在短短的 80 年间，帝国主义依仗坚船利炮，威逼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了 100 多个不平等条约，强占中国 150 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勒索 7 亿多万两白银的赔款，逼迫中国开放几十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在许多城市建立租界，并获得片面最惠国待遇，协商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军警驻扎权及内河航行权、铁路修筑和管理权、邮电管理权，开施工矿商行和银行权，向中国贷款权……。总之，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丧失了政治上、经济上的独立地位，把中国拖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苦海，给中国人民带来无可伦比的灾难。

在侵略中国的过程中，帝国主义者发现，单靠他们的数万侵略军以及鸦片贩子、商人、传教士和一些杀人越货的匪徒、冒险家，是不可能牢固统治中国的，于是，他们采取了极其毒辣

的一手，就是扶植中国封建势力和买办势力，收罗一批中华民族的败类，利用他们作工具来统治中国。寡廉鲜耻的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王朝，甘作帮凶，残民卖国，成为“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封建统治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可耻走狗，它们二者是中国近代贫穷落后的罪魁祸首和根本原因。

落后就要挨打，不断地挨打就更加落后。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从根本上摆脱落后，就唯有革命，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

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中国人民是不甘沉沦、不甘受欺侮的。早在 1828 年就发出了反对外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闹西洋的怒吼”。近代以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马建忠、郑观应、康有为等一批仁人志士纷纷探索强国御侮之路，革新思想闪耀着多彩的光圈。中国人民则奋起反抗，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革命、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镇南关抗法、黄海大战、台湾保卫战、义和团运动，……此起彼伏的斗争，都是射向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箭镞，“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反抗精神”。

更大的革命风暴来自资产阶级。“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于 1894 年组织了兴中会，并相继举行反对清朝政府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将革命思想遍播海内外。之后，一批革命小团体相继成立，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及上海的爱国协会、福建的益闻社、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易知社、四川的公德社、云南的誓死会等。1905 年孙中山“召集同志，合成大团”，将各个革命小团体合并组成中国同盟会，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相号召，开展了武装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反清起义如火如荼。

1906年，萍浏醴起义。

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钦廉防城起义；12月，镇南关起义。

1908年3月，钦廉上思起义；4月，云南河口起义；7月和11月的安庆两次起义。

1909年，广州新军起义。

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

同时，城乡人民的抗捐抗税，反饥饿的抢米、反洋教的斗争风起云涌。1905年，发生88起；1909年，发生113起；1910年则增至290多起。

这些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阶级联合绞杀下，虽然都失败了，但它程度不同地打击了中外反动派，推动和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孕育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清朝统治阶级对人民斗争惊恐不安，惊呼“盗风增剧，将酿巨乱”，其统治“已成危象”；“危疑几不可终日”。“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全国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黑云压城，临危义士揭竿起；

同仇共战，黄鹤楼上十八星旗迎风扬。

1911年10月9日上午，“共进会”领导人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宝善里一所宅院里配制炸弹，身旁一人口衔卷烟，火星飘到炸药里边，引起燃烧，顿时满室浓烟，从窗口冲上屋顶，直上云霄。

就是这簇因不慎失事而腾空上升的浓烟，竟成了引发全国起义、埋葬清王朝的革命烽火。

时至 1911 年，清朝统治已是危在旦夕。这一年，陕西盛传一首民谣：

“不用招，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

今年猪吃羊，明年种地不纳粮”。

宣统皇帝是 1908 年 11 月光绪皇帝和那拉氏死后即位的，即位那天，3 岁的宣统帝坐在宽大的“龙床”上，望见下面王公大臣们一起一落地跪拜，不知是怎么回事，急得大哭大闹。跪在旁边的摄政王载沣连忙哄他：“别哭别哭，快完了，快完了！”意思是这个接受百官朝贺的礼仪快要结束了。可是王公大臣们却心里一怔，感到载沣说的话是清王朝快要完蛋的不祥预兆。民谣和清朝统治阶级的感觉，都反映了人们对清王朝岌岌可危形势的感受。

为了维持其垂危的统治，清王朝加紧玩弄“立宪”骗局。1911 年 5 月，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但在 13 名内阁成员中，却让皇室和贵族占 9 人，掌握主要权力，实际上是撑起责任内阁的幌子，继续推行皇室贵族的专制主义统治。这个皇族内阁一出场，就颁发所谓“铁道国有”令，宣布将已准各省集资商办的铁路干线一律收归“国有”。随即又同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路借款合同”，以出卖铁路修筑权换取奴役性的外债，讨好帝国主义。

皇族内阁的出笼，暴露了清王朝以立宪其名行集权其实、坚持专制统治的卑劣意图；拍卖全国铁路主权的“国有”政策的颁布，则表明其死心塌地向帝国主义屈膝投靠。如此行径，激起全国人民万分气愤，立即发出了一致反对的呼声。与川汉、粤

汉铁路相关的川、鄂、湘、粤四省，大举展开保路的斗争。

在湖南，学生罢课，工人示威，全省抗缴租税；在湖北，宜昌筑路工人与清军发生武装冲突，击毙清军 20 多人；在广东，粤汉铁路股东会议一致抗议清政府“强占粤路”，力争商办；四川反抗尤烈，成都每街均设保路协会。全川先后成立女子保路同志会、重庆保路同志会和各州、县、街、乡、镇的保路同志会，人数达几十万。9 月，保路斗争发展为全省抗粮抗捐，各地发生贫民暴动。凶残的清政府下令镇压，号称“屠夫”的署四川总督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和川路股东会的负责人，枪杀几十名请愿群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愤怒之极的四川人民用武装起义来反击清政府的残酷镇压。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乘机组织同志军在各地起义。旬日间，起义烽火燃遍 10 余州县，人数达 20 万，荣县还宣布独立，成立了革命政府。四川大起义的形势引起清政府的极大恐慌，“川亡固在旦暮”情急之下，匆忙调派端方率湖北新军前往镇压。然而挖疮补肉，此举又造成武汉的紧张形势，引发了更大的革命风暴。

武昌号称“九省通衢”，是清朝统治的一个重心，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活动的地方。从 1904 年起，湖北的革命党人就相继组织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等革命团体，进行革命宣传与组织工作，也曾发动过起义。到 1911 年，上述团体演变形成两个大的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文学社以“研究文学”为名，在新军士兵中开展活动，吸收社员达 3000 多人，通过他们，掌握了部分武装。共进会原以联络会党为主，几次起事失败后，感到单纯依靠会党不行，“只有从运动新军入手，利用敌人的实力，转而为革命的劲旅，这种借矛夺盾的方法，确是上策”。经过广泛发动，亦在新军中发展两千多人。1911

年 4 月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随着铁路风潮的汹涌澎湃，文学社和共进社都积极策划在武昌起义，“虽黄花岗前，死气沉沉，而黄鹤楼头，又生气勃勃了”。斗争形势迫切需要两个组织统一力量、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9 月 24 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领导武昌起义的统一的总指挥部，推举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共进会首领孙武为参谋长，决定在武昌小朝街设军事指挥部。起义原定在 10 月 6 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后因准备不及，延迟到 10 月 11 日。

会后，革命党人立即拟定文件，绘制旗帜，制造炸弹，配制弹药，印制钞票，购置手枪，紧张地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不料，10 月 9 日孙武在俄租界制造炸药不慎爆炸，孙武重伤被送往医院。俄国巡捕闻声赶来，将革命党人的文告、名册、弹药、旗帜、符号等搜去，并报告清朝当局。

蒋翊武闻讯后，立即召集会议，商定：当晚十二点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但清朝当局密布岗哨，严格盘查行人，负责传递起义命令的邓玉麟千方百计赶到南湖炮队时，时间已过十二点，且人多入睡，猝不及备，信炮未发，当晚起义的计划流产了。

这天晚上，武昌小朝街起义总指挥部被清廷破获，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 3 人被捕，蒋翊武乘杂乱逃走。湖广总督端方在抓到彭、刘、杨革命党人后，得意忘形，当晚就开庭审讯，于次日凌晨下令杀害了威武不屈的 3 位革命党人。并下捕党人令：凡告密者，与捕得党人者同赏；匿而不告者，与党人同罪；学生无保证者，勒令退学；有剃辫者，令蓄发；责成主管者约束兵士，不准出营门；如有私藏子弹及炸弹者，处死刑；有党籍

者，连坐其父兄及长官。随即，清朝当局的侦骑四出，闭城搜索，大肆捕捉革命党人，武汉三镇一片恐怖气氛。

然而，“烈士一死满清亡，掷好头颅报轩皇”。清朝统治者的残暴与疯狂，激起革命党人的更大怒火，“痛三烈士之惨死，义愤填胸，急思一逞，有与三烈士俱死之慨，顾一时无人发号施令，乃各自为谋，决定及夕起事，不约而同”。虽然起义指挥机关被毁，首领失却指挥。但形势危急，革命党人自行联系，毅然决然地发动了起义。

10月10日，革命党人蔡济民、熊秉坤等约定当晚点名时发难，以枪声为号，并通知各标营响应。邓玉麟也答应一闻城内枪声，南湖炮队即发炮攻城。晚上七点钟，熄灯号吹过了，紫阳桥的工程营第八营革命党人荷枪装睡，反动军官见金兆龙抱着枪，要捆起讯问，金兆龙奋起反抗，革命党人闻声赶来，击毙了反动军官。熊秉坤随即赶来，率众进攻楚望台军械库。守卫军械库的革命党人响应起义，很快就占领了楚望台。清脆的枪声传遍武昌城，激励着各处的革命党人行动起来。各标营，测绘学堂的革命党人群起响应，南湖炮队响起了隆隆炮声，驻扎在塘角的辎重队放火助威。经过勇猛的冲杀，革命党人很快就占领了蛇山和各城门。他们在楚望台和蛇山两个制高点上架炮对准湖广总督衙门频频发炮，然后分三路发起猛攻。总督衙门起火了，瑞澂丧魂落魄，从督署后墙打开一个洞逃跑，清军统制张彪也逃走了。经过一夜激战，起义军控制了武昌。11日晚和12日晨，起义军又和汉口、汉阳革命党人配合，攻占了两城，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武昌起义胜利后，湖北军政府即于10月11日在武昌宣告成立。因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孙中山尚在美国，黄兴在香港，起

义前推举的领导人不是被捕被杀，就是受伤、逃匿。于是，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相当旅长）黎元洪被推举为军政府都督，原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被找来任总参议。革命党人组织谋略处，担负起军政府的领导责任。咨议局决定称中国为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成立湖北军政府，下设参谋、军务、政务、外交等四部，并设立“招贤馆”，以搜罗人材。军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并发布了有关内政、外交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文告，其基本精神有以下几点：

（一）宣布创立民国、实行共和政体，实行“与民更始、共同富强”的革命宗旨。（二）声讨清王朝的罪行。（三）照会驻汉口各国领事，表示对各国友好，承认清政府过去与各国订立的条约，愿意承担过去的赔款及外债，保护外国人的财产和既得权益；要求各国不要援助清政府，否则将以敌人看待。（四）颁布刑赏律令和军令，宣布军事纪律。（五）宣布免除盐烟酒糖土膏捐税以外的苛捐杂税。（六）劝告清朝政府各级汉族官员和清军汉官反正。（七）号召全国同胞迅速奋起推翻清朝统治。

武昌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帷幕。

举国皆应，革命潮流逐浪高；

四面楚歌，宣统退位清朝终。

“武昌首义天下应”推翻清王朝的战斗已经打响，革命以势无阻挡的形势迅猛发展，全国各地的起义和独立连续不断，腐朽不堪的清朝统治顿时崩溃了。

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早就和

武汉的革命党人约定，如果湖南发动起义，湖北随即响应，湖北发动起义，湖南马上响应。武昌起义消息一到长沙，焦达峰立即集结会党和新军。10月22日，焦达峰和另一革命党领袖陈作新率众攻入长沙，杀死巡防统领黄忠浩，巡抚余诚格爬墙逃跑，长沙解放。革命党人立即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南都督府”，焦达峰任都督，陈作新任副都督。

同一天，陕西革命党人在井勿幕等领导下起义，攻占省城西安，公推同盟会员张凤翔为陕西复汉军大统领（后改称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接着，革命军攻占渭南、临潼、潼关，西北、华北为之大振。

10月23日，江西九江革命党人起义。31日，南昌新军起义，占领南昌，建立江西军政府，吴介璋被推为都督。

10月29日山西革命党人起义，杀死巡抚陆钟琦，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

10月30日，云南爆发起义，昆明光复，蔡锷为云南都督。

11月3日，上海革命党人起义，陈其美被举为都督。

随后，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四川等省分别独立或起义，在革命高潮，清朝政府的海军也大部分起义。到11月底，内地18省基本全部光复，清政府所能控制的只有河南、直隶、东三省等地。而且即使在这些地方，也爆发了规模不等的起义。在四面楚歌中，清王朝迅速走向崩溃。

武昌起义的胜利和18省的相继独立，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就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各派（革命派、立宪派、旧官僚）政治力量重新组合，形成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和以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为代表的江浙集团，两派展开了争夺中央政权控制权的活动，在中央政府人员组成和政府所在地问

题上，僵持不下。这时，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

孙中山是长期在国外领导反清革命的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他从美国经英国伦敦、法国马赛回到上海，受到全国各界群众的欢迎。孙中山抵达上海的次日，与在沪同盟会主要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张静江等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孙中山主张采取总统制，这个意见得到黄兴等多数人赞同。12月13日，各省代表提名孙中山、黎元洪和黄兴为总统候选人，29日，各省代表会召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17省代表参加会议，每省一票，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三分之二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从上海乘专列抵达南京。全城欢声震天，军乐高奏，长江江面的军舰鸣礼炮21响。当晚11时，孙中山在前清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时的天王府）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誓词中说：“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同时发布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和《告全国同胞书》，规定对内方针是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政统一，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奠定中华民国的牢固基础；对外方针是清洗政府“辱国之举措”。1月2日，孙中山通告各省改用新历，定国号为“中华民国”，1912年为中华民国元年。1月3日，各省代表选举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讨论孙中山提出的各部长名单，最后决定南京临时政府各部总、次长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

革命的对象则是另外一种景象。武汉起义，对清朝统治阶级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从皇室到文武大臣是一片惊慌。在“大事去矣”的哀叹中，清廷拼凑了两镇（相当于后来的师）陆军，开赴湖北镇压革命。然而，北洋军是由袁世凯操练出来的，别人指挥不了。袁世凯当年向西太后告密，使光绪皇帝被囚瀛台郁郁死去。西太后死后的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的弟弟，他要报此仇，于是将袁世凯以“足疾”之名赶出朝廷。袁世凯早就作了准备，让心腹、亲信把持清朝各部门，尤其是牢牢控制着北洋军。所以，当北洋军南下武汉时，他就指示统军的亲信冯国璋、段祺瑞等“慢慢走，等等看”，让革命党把事情闹大，使载沣一伙无法收拾，以便乘机夺权。革命烈火迅速燃烧，北洋军又不听指挥，素性懦弱的载沣只好“忍泪屈从”，再次请出袁世凯这个老头。10月14日，载沣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匪”事宜。袁世凯却嫌职权太小，以“足疾未愈”为借口拒绝出山。在各地竞相起义和独立的形势下，载沣只好答应袁世凯提出的六项条件：（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此次事件诸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之全权；（6）须与以十分充足之军费。10月30日，载沣下罪己诏，解散皇族内阁，宣布解除党禁，命参议院起草宪法，第二天即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其实，袁世凯的六条件是有深刻含义的，这时的他有一个精心打算的如意算盘，即“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接洽；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一箭双雕，建立自己的专制独裁政权，所以六项条件中的开国会、除党禁、宽容武昌起义诸人等是对革命党人的诱饵，而要害是从清政府获得军政全权，以使他操纵一切。为此，他在受命组阁后，双管齐下，

一方面督促冯国璋等率北洋军猛攻武汉，在攻陷汉口后放大火连烧 3 天 3 夜，向革命党炫耀武力，胁迫革命党与之开始“南北议和”，另一方面则利用革命声势向清廷“逼宫”。

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深知其目的是不容易实现的，必须借助外国势力。而帝国主义也看到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不能继续维持下去了，绞杀中国革命、维护其在华特权的出路就是培植一条新的、更疯狂有力的走狗，他们选择了袁世凯，于是，两者勾结在了一起。列强驻华公使走马灯似地轮流向清廷劝进：赶快起用袁世凯，“如果清廷能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并会很快地被镇压下去”，“吾等对于袁世凯深加敬爱，……此种政府，吾等将于外交上竭力相助”。对南方革命党，帝国主义先是出面“调停”，压迫革命党与袁世凯谈判，接着发出威胁，声称“中国目前斗争之继续存在，不惟足使中国本身抑且使外人生命财产遭受危险”，要求“双方代表注意，尽速成立和解，停止现行冲突之必要”。并调集军队作出武装干涉的姿态。

为了使革命党屈服，袁世凯还致电南京宣布政见，表示“绝对赞同共和”，说“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信誓旦旦，迷惑革命党人同意其执掌革命后的政府大权。当获知 17 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袁世凯恼羞成怒，下令中断和谈，指使北洋军将领冯国璋、段祺瑞等通电“誓死抵抗”共和，压迫革命党。

在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面前，革命党表现出了其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当时革命党的实际领导者黄兴在汉阳失守后，慑于袁世凯的军事压力，对议和充满幻想，企图以“和

谈”来取得“廉价”的胜利。他主张只要袁世凯赞成共和，清帝退位，让袁世凯作总统未尝不可。另一位有影响的革命党领袖宋教仁醉心于革命后的议会斗争，“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政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因此不反对南北议和、袁世凯出任元首职务。以刺杀摄政王而声誉不凡的汪精卫则被袁世凯收买，“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孙中山虽然反对妥协，但由于黄兴等多数人坚持，只好同意。革命党人提出议和纲要四条：推翻清政府；实行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待满，同意与袁世凯议和。黄兴并致电袁世凯，保证袁“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不久，孙中山亦被迫致电和谈代表伍廷芳，要他转告袁世凯：“文不忍南北战争，生灵涂炭……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

野心勃勃的袁世凯见大总统的宝座可以抢到手，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向清廷“逼宫”。1912年1月16日，袁世凯率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连续召开两天的皇族御前会议，赞成共和的只有奕劻和溥伦等被袁世凯收买的少数几个人，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袁世凯得此消息，一面上奏折进行威吓和引诱，说革命军势力很大，徐州已失，如长此拖延，皇室指日可灭；如不赶快赞成共和，则优待皇室的条件就不一定有保证了；一面派赵秉钧、梁士诒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 19 日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在会上进行威逼诱骗。但王公贵族几乎都反对共和，良弼等“宗社党”分子在会后积极活动，准备组织新内阁，取代袁世凯。1月26日，良弼在回家途中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王公贵族更为惶惶不安。1月27日，袁世

凯又指使北洋军将领段祺瑞等 40 余人联名向清廷发出通电 要求立即采用共和国体。胆战心惊的皇亲贵族感到大势已去。1 月 29 日和 30 日，清廷连开御前会议，决定“逊位”以取得优待条件。隆裕太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于 2 月 3 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袁世凯于当天打电报催伍廷芳将优待清室条件速定下来。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优待条件”，于 2 月 12 日颁发《清帝退位诏书》，宣布清帝逊位。

清帝宣统退位，结束了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从此，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消失了，这是武昌起义开端的辛亥革命的最大功绩。

共和思想，在辛亥之年深植人心；

千年帝制，从此一去不得复还。

1912 年 2 月 14 日，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去临时大总统。2 月 15 日，临时参议院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从此，中国开始了北洋军阀的统治。

辛亥革命的斗争实践，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是一个软弱的阶级，它既不能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彻底进行民主革命，又不敢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所以它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革命果实后，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依然处在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 人民困苦日甚一日”。辛亥革命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失败了。但是，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

史上的伟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它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西方带回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企图按照西方的模式，改造中国，在当时腐朽、专制的反动统治下的贫穷、落后、愚昧、保守的旧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武昌起义引发的全国革命，则将民主共和的思想付诸于实施，推翻了统治着中国 260 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 2000 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它破天荒的功绩，“把皇帝从他的宝座上面一脚踢下来，建立一个没有皇帝的共和国，对于身受专制统治的人民曾经是一个多么令人兴高采烈的事件。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 2000 多年 皇帝在人们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辛亥革命把这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一下子打倒了，这就是一个大胜利。皇帝可以打倒，还有什么反动的东西不可以打倒！”特别是广大人民亲眼看到这个封建专制制度崩溃下去，其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当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认为革命的胜利就是新生活的开始。试看武昌起义以后立即出现许多党派、争取参加政府，它们的活动反映了民主精神的高涨。列宁在当时十分称赞这种新气象，他在 1913 年《亚洲的觉醒》一文中说：“中国不是早就被称为长期完全停滞的国家的典型吗？但是现在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涨正在汹涌澎湃地发展”。

事实正是如此。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个漫长的历史上，从秦始皇建立第一个封建国家——秦朝到清朝末年，2000 多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处在专制政体之下，皇帝是天子，他至尊、至大、至圣、至贵，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皆属皇土；亿